

制度性贫困与反贫困力量考察

蒲文胜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社会建设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贫困”、“反贫困”、“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化议题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全球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以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在全球“结社革命”以及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冲击下,政治上左、中、右翼都不约而同地把其理论和政治视角投向了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力求在新的对话和实践方式下寻求解决贫困的方法。

关键词: 资本主义制度; 贫困; 马克思主义; 公民社会; 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 F1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4)01-0077-06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4.01.014

本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股力量的现实交锋中,“贫困”、“反贫困”、“可持续发展”始终是全球化议题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从世界银行每年提供的全球减贫数据看,人们似乎有充足理由相信全球人类正在“谋求共同福祉”的全球化道路上积极迈进。而另一些来自非官方学术团体或机构的研究,不但从全球范围内证实了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而且深入到制度层面,尤其是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蔓延到今天欧元区国家经济、社会危机从而导致大量失业和返贫人口陡然攀升这一具体事件——极为深刻地剖析了全球化,认为当今占主导模式的全球化非但没有减贫,而且陷入空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本文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从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考察人的物质与精神贫困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从而走出生物学、人口学意义上的贫困研究范式;同时,考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后的贫困问题;以及现实人类该选择和依赖怎样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抗击资本主义制度背景的全球化,谋求人性化的全球人类发展道路。

一、制度致贫及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如果仅从生物学、人口学的角度研究贫困,那么人的贫困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纯粹关系。因为任何生物种类或个体的生存和繁衍既取决于其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优劣程度,也取决于其世代积累的生存技巧或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物质的能力强弱。而贫困的根源当然也就归结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口素质的低下和人口的超负荷膨胀。所以,“环境决定论”、“贫困文化论”、“素质贫困论”、“能力贫困论”等都可以就一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种族、人群及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为何不能致富及为何失去了致富的动因。这类基于生物学、人口学的贫困问题研究范式,适合于社会较为封闭、社会结构简单且不同社会阶层间冲突较小的社会系统。相反,社会系统越是开放,交往的领域和程度越是广泛和深入,那么资源的有限性及人口扩张之间的矛盾将完全覆盖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单纯交换关系。其次,社会结构越是复杂,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差距越是拉大,且政府与经济行为互为勾结并从制度层面极力保护社会贫富对立结构,那么贫困问题也难以从人与自然界的交换能力强弱上找到合理解释。因而,研究贫困问题还有待于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层面,深层次地考察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

研究社会制度与贫困关系的权威人物当属马克思。早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第一次直接研究了贫困问题。“他认为,正是维护私人利益、私有财产的自私逻辑”,不但形成了社会贫富对立结构,而国家权威也变成了林木所有者

【作者简介】 蒲文胜,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社会建设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贵州省社科规划自筹经费项目“全球公民社会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GZZC14)、贵州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贵州反贫困综合战略研究:基于政府、市场、民间社会合作治理理论视角”(项目编号:2011LKC20392010)阶段成果。

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①正是对这些譬如林木盗窃法、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问题的关注,推动着马克思从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研究。马克思在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后,他把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恢复到历史真相,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这个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后的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研究范式得以确立,而对贫困及其根源性问题研究也就始终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而展开。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②。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无论是社会陷入衰落还是处于最富裕的状态中,“对工人来说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③一句话,贫困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制造,但其却又巧妙地把贫困提交给其他领域,或者恐吓或者假仁慈地迫使贫困者认命或者感恩社会救助。他们的理论家说,“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因为“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④。而已经知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的人道学派,“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⑤至于国家,如马克思说,“如果一个国家越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么这个国家

就越不愿意认为社会的缺陷的根源就在于国家的原则,在于现存的社会结构”^⑥。例如英国国会指出,“贫困的根源在于自然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人口的增长总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另一方面,英国又认为赤贫是由于穷人的不良意愿”^⑦,英国如此,法国、德国也如此,总之,资本主义的永恒制度和贫困没有关系。

剥开资本的历史,它所制造的社会贫富对立现象便一目了然。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马克思描述了英国的圈地运动,英国为了追逐纺织业带来的高额利润,使用暴力把大量无技能农民从其不动产——土地那里驱逐出去从而成为一无所有的街头流浪汉。以致于英国不得不在1601年颁布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济贫法》。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对财富的狂热,正是其他民族极度贫困的根源,马克思描述到“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⑧因而,研究贫困,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离开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只能找到贫困的某种表现形式,却找不到贫困本身的原因。^⑨马克思在谈政治经济研究方法时说,“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⑩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运转的根本前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制。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必须出卖其廉价劳动力时,资本则“把它找到的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⑪这样,一条无形的链条(依附与被依附、剥削与被剥削)在资本的维系下显得如此“和谐”,正如“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①。根据“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资本为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会想方设法地推动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个过程也是资本与资本的竞争和机器排挤人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也即大量失业和贫困产生的过程。可以说“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②，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③；“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④

这正是马克思用其毕生精力研究和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当然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⑤但问题是，资本所迅速积累财富的起点，正是无产者深陷且无力摆脱贫困以及自然环境与资源遭致严重破坏的资本主义制度起点。人仅仅是这个制度追求财富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人在全面地异化和普遍地贫困化，而这个制度本身也在间歇地癫痫式地爆发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主要源于自然灾害、瘟疫、族群战争和落后的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的贫困则来自于这个制度本身，它使人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使自然界陷入不可再生的生态贫困，并且所有这些贫困的程度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的贫困 与全球性不平等

马克思的学说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视之为理论武器。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揭开了社会形态由低至高的历史必然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

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⑥在未来高级的社会形态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将消失，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将由自由人类联合体共同占有和控制，每个人都将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不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所说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必然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发轫于西欧，确切地说是英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⑦恩格斯也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英国最快最容易。”^⑧但是在马克思晚年，也即俄国废除农奴制之后，俄国能否不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阵痛而直接进入高级社会形态，也即能否通过“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使他的一贯性（西欧社会）研究出现了分支。对此，马克思做了这样的分析：俄国是欧洲唯一的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国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使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另外，如果俄国革命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双方互补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马克思也仅仅是把这种可能性或假设留给了俄国便离开了人世。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似乎给“卡夫丁峡谷”问题划上了句号，但这并不意味着物质和精神贫困问题的终结，相反，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自我陶醉于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后，发现精神世界的过渡膨胀以及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之间的错位正日益加重社会的贫困化程度。前苏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曾在较短时间内由生产力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发展为工业强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它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财富却仅仅体现在国家资本那里,人民仍然是贫困的。就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的分析,前苏联为了完成追赶任务,实行了高积聚的经济政策,“在这种积聚的要求下,工人所完成的劳动价值和分发给他们的工资价值之间的差距变大了,或者,尽可能的被拉大了。如1938年,苏联的生产总值被设定为1840亿卢布,其中,1145亿卢布被用作生产资料的生产,只有640亿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工人的工资报酬就在这一部分里面”,“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镇压和流放就成了前苏联常见的现象,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展开了一种似乎是不真实的生活,一个人除了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外,其唯一的选择就是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①前苏联国家资本的高积聚模式从1929年斯大林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其解体前的历届领导人那里都几乎没有改变过。然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压却在内部系统掩盖了贫困真相。不过,从系统之外看,“1989年苏联人均消费为美国的20%,80年代中期,苏联居民饮食消费占消费开支的40%,而西方国家仅占15%左右;1990年,苏联人均住房面积为16平方米,而西方国家为30~40平方米。”^②可见,“苏联社会经济的增长的战略目标并非为了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并非旨在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要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③1991年,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尽管人们对此颇有说辞,但人民生活的贫困及政治高压是其崩溃的重要原因。

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剧变,使人们再次陷入社会制度以及制度致贫/致富的形而上的巨大反思当中。在中国,政治高层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欢呼其和平演变战略的成功外,聚集在资本主义大本营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政界、商

界和知识界开始筹划和积极推动能够给“全球人类带来共同福祉”的全球化(华盛顿共识),他们要重新树立资本和市场的权威,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那些因战后实行高福利政策出现经济滞胀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因追求工业化或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如此一来,自上世纪90年代起,亲西方和亲资本的政策倾向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盛行开辟了道路。如罗纳尔多·蒙克说“在近几十年,除了其他关系之外,经济关系已经从一种国际维度发展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维度。…资本已经排除了任何国家的界限。资本主义已经渗透遍及全球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处于新的‘全球工厂’的工人们再一次变成纯粹的商品。”^④

客观地说,资本和市场权威的重树的确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在推动技术革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上取得了一定绩效,但财富积累的总量却并没有公正地分配到劳动者手中,相反,全球性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极度恶化以及劳动的异化、不快乐感和过劳死程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世界银行不时地提供全球减贫数据,但这个数据仅仅是以每日1.25美元收入为判断标准,它没有考虑该收入将要承担的工作压力和实际购买力情况。比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穷人为了这1.25美元不得不去干高风险、低报酬、没有尊严的工作,而穷人用尽他的全部收入也无法享受到昂贵的譬如纯净水、基本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公共物品。很显然,1.25美元在不平衡的全球经济布局中折射出的是穷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资本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它考虑的是如何从最廉价资源那里获利,而不是考虑现实人处于怎样的生活境地。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之内的资本运作全都如此。据相关研究数据透露,最近30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呈上升趋势,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

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

① 张生 《积聚与消耗:苏联的工业化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试析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② 马蔚云 《经济转轨以前俄罗斯人口贫困状况及原因》,《人口学刊》2010年第3期。

③ 林跃勤 《苏联经济赶超失败探源》,《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

④ [英]罗纳尔多·蒙克 《马克思在21世纪:晚年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最富人群与最穷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指数式倍增……全球化带来了财富增长,但是这些财富却集中在‘超级巨富’手里。”^①这个并非把人作为目的的全球经济制度正在使全球穷人以透支生命的方式为各种形式的资本、跨国资本疯狂地积累财富所犯下的非人道非正义罪恶埋单。

三、反全球贫困及各种反贫困力量辨析

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辩证场域。即便新自由主义在推动其经济政策时,它的政界、商界、企业界、知识界联合占领了意识形态“高地”,并且“自上而下”地打压和解散工会组织,使工人丧失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保护主义等却从未退却过,而被称之为“全球正义运动”、“反全球化运动”、“世界社会论坛”等社会运动形式正不断升级,提出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积极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由于危机的冲击,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削减福利,缩减工资,缩减就业岗位政策,并且把纳税人的钱拿来救市,挽救那些贪婪的金融资本家,这些举措无疑激怒了民众。自2010年起,希腊爆发了反抗紧缩示威游行。法国举行了数十万民众的反对提高退休年龄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抗议学费上涨和多地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西班牙爆发了抗议高失业率示威游行。在美国,2011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迅速地蔓延到其他城市,义愤的民众走向街头批判贫富急剧分化的社会制度。理查德·沃尔夫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荡不应该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②

在拉丁美洲,这块深受新自由主义压制和财富掠夺的领土目前是抗击新自由主义最为坚决的领地。它们的人民(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的形式,冲破资本主义制度的阴霾,建立新型的社会制度才是唯一出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我们不是人类,而是消费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球母亲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原材料。”^③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嘲讽,也告诫了人们,见物不见人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将最终毁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虽然这些“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种种策划与宣言极大地鼓舞着人们,而早年马克思也说过“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④,不过,现实的全球化场域中并没有爆发一场纯粹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革命,连续不断的工人罢工、示威等大规模抗议行动也并未表现出要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明显迹象。究其原因:一是人们仍局限于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把专制、贫穷等同于社会主义,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发展均未达到一定高度,因而工人运动没有反映出追求高级社会形态的理想目标;二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高福利政策,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资本主义仍抱有迷幻,把社会进步寄期望于社会改良;三是左翼政党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有限且长期追随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阶级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和领导。四是新自由主义对工会组织的打压和强行解散,使工人阶级的整体阶级意识淡化。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激烈的劳资矛盾必然上升到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理论逻辑与现实产生了距离。

深受葛兰西公民社会理论影响的保拉·奥尔曼提出,应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普遍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教育,她认为仅仅依靠改良是永远不能完结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如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无法用凯恩斯政府干涉经济理论来改变社会一样,这种方法对于诊治全球资本主义同样无效。因而,人们必须把目标定位在社会的革命转型上来。而转型的起点就是对意识形态的争夺,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去唤醒人们。^⑤当年的葛兰西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爆发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已经把它的霸权意识

① [美] 威廉·I·罗宾逊 《全球资本主义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② [德] 理查德·沃尔夫 《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参考消息》2012年3月16日。

③ Evo Morales. Save the Planet from Capitalism, <http://www.org.au/node/769>. 2008-11-28.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241、309、277页。

⑤ Allman, P. Critical Education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Karl Marx and Revolutionary Critical Education, Sense Publishers, 2010: 10.

形态渗透到了公民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保护国家机器的坚固堡垒,当受到外来攻击时,进攻者也许能摧毁外部的国家机器,但却不易摧毁其背后的更坚固的防线即公民社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公民社会)与资产阶级展开阵地战,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

出于理论上的敏锐,更是基于对本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和全球“结社革命”的深刻把握,政治上的左、中、右翼都不约而同地把其理论及政治视角投向了公民社会(包含NGOs、NPOs)、全球公民社会的研究上。对新葛兰西主义(左翼)来说,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标明了全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已拉开序幕,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已暴露无遗,世界历史的方向将最终掌握在形成整体阶级意识之后的无产阶级手中。而在右翼(新自由主义)那里,认为NGOs、NPOs的迅速成长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就慈善、扶贫、合作治理等方面的积极表现均得益于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推动。因为市场化原则不但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能力和自由民主的空间,而且迅速地形成社会组织化、自助化生活空间。中翼认为,全球化应该是新型的全球化,它不属于西方,更不属于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对国家与市场权力的制衡,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中翼在预感到全球风险社会必将出现的同时,强烈呼吁公民社会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期望国家、市场、公民社会能够共同治理全球公共物品问题(譬如贫困、环境、转基因食品等等)。对激进主义而言,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不但意味着“继续革命论”,而且社会运动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国家

霸权的颠覆,但国家和社会究竟该如何转型,在激进主义那里没有统一答案。

左、中、右翼对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的关注,无疑是在传统的东、西方“阶级斗争”、“革命”、“暴力”等话语之外找到了新的对话方式,尽管公民社会的类型、行为方式及价值诉求各不相同,而且也很难预测充满异质性的全球公民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反全球贫困问题与自身的经济利益区别开来,但是从近些年的实践看,一些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在生态环境保护、债务减免、反血汗工厂、扶贫、人权、反性别歧视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泛滥的有力反击,也实质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社会的进程。杰里米·格兰瑟姆说“资本主义已经向我们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说对了一部分。他们当时期望出现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资本主义更加强大并过度扩张,最终达到不顾后果的‘境界’。全球化会为资本家提供更多自取灭亡的工具……”^①按马克思的话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②而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这个源于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的产物,它的辩证发展过程也正日益显示出其在反贫困道路上的积极作为,人们期待着它在促成全球社会巨大转型中发挥有效作用。同时,世界人民更为关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贫困实践中所积累和取得的宝贵经验,它正确地运用和发挥了资本、市场的功能,且又能够有效驾驭和引导资本,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让资本创造更多财富,造福于人民。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Poverty and Poverty – eradication Forces

PU Wen – sh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Poverty”, “poverty – erad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the core topics in the issue of globalization.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not only makes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der, but also leads to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association revolution” and “anti – globalization movement”, the political left, the middle and the right all focus on the study of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order to find some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 to poverty – eradication through the new dialogue and practice.

Key words: system of capitalism; poverty; Marxism; civil society; poverty – eradication

(责任编辑 俞 茹)

① [美] 杰里米·格兰瑟姆 《“不计代价求增长”将致资本主义灭亡》,《参考消息》2012年3月15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